

# 让理论“照进”实践

## ——浅谈我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现状和趋势

黄昱宁 / 上海译文出版社

**摘要** 本文以一线外国文学编辑的视角谈了我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现状,以及将来的发展趋势。提出文学翻译受到时代变化、文学潮流嬗变、翻译观的影响。当前文学翻译的质量总体并未下降,而图书市场的变迁给文学翻译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与机遇,传统的文学翻译观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让翻译学理论研究成果更多指导实践工作,同时增强行业活力,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关键词** 文学翻译 出版市场 翻译观

以下几点不成系统的感想,是糅合了几次在不同场合就相同问题——我国翻译出版的现状和趋势——所作的发言。对于翻译理论,我只懂一点皮毛,本无资格班门弄斧。但是屡屡得到发言机会,按我的理解,一方面是因为我不仅代表我个人,也代表我的工作单位,全国最大的专业翻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对翻译学术发展的长期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可能也因为在文学翻译实践中同时担任着几重角色。我的正职是外国文学编辑,其中案头的那部分需要审阅大量译稿,同时业余从事文学翻译,也就是说,在整个翻译的流水线上,我有时候直接制造产品,有时候负责检验。对于这个链条的发展变化,以及哪里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算是积累了一点经验和体会。另外,作为一个评论和随笔的写作者,从某种程度上,我也能尝试着站在“作者立场”上看待翻译问题。基于以上理由,我才有勇气粗略汇报一下个人对于我国文学翻译出版的现状及趋势的认识。

### 一、直面一个敏感问题:如何客观评价当下的翻译质量

如今随便打开一份读书类或文学类的报刊,几乎都会看到对于翻译质量的指责和投诉,我本人也接受过很多这样的采访。所以我想,要谈我国当下的

翻译出版现状,这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既然伸头一刀缩头一刀,那我还是先谈谈我的看法。尽管必然招致争议,但我还是愿意旗帜鲜明地表态,在综合考核的基础上,我不认为总体质量在下降,甚至某些单项还有提升。那么,为什么会给读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呢?我觉得原因如下:

首先,随着时代的发展,译介作品数量呈几何级数增加,懂外语的人数也以几何级数增加。其结果是,因为总基数大,所以其中质量不尽如人意的作品的数量亦随之增加,而可以在对照原文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批评的人数和为这种批评提供的宣传渠道却远比几十年前大大增加,所以造成“翻译质量每况愈下”这种印象的放大效应特别明显。但这并不等于说,劣等译作在译作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就比几十年前有明显增加。事实上,工具书、参考资料及互联网的发展,为当下译文的准确性提供了远比多年前优越的“硬件”,我们能轻易找出那些本身就欠缺资质的出版社出的不合格次品,列举那些因为“提速”而发生的“翻车”事件,但我们同样也能找到在各方面都居于水准之上的译作。仅就我个人工作多年来接触到的译作,就举得出很多我觉得拿到哪里都可以面无愧色的例子。

其次,考量译作的好坏,不能离开它诞生的历史背景和历史语境。桑塔格说:“一个个译本就像一座座建筑物,如果它们有任何出色之处,时间的光泽会使它们更出色。”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留下的译作本身已经经过大浪淘沙,我们耳熟能详的都是其中的精品力作。此外,翻译作品对于母语文学所构成的新鲜刺激,那些起初可能会让读者轻微不适的感觉,是需要随时

间流逝才能被渐渐接受的;甚至,当那些新元素悄悄融入我们的母语,并最终改变我们的现代汉语时,我们回过头来才会觉得它们当初被翻译得如臻化境。我们在为那些学贯中西的名家的神来之笔击节赞叹之余,也不能不看到,因为资讯条件所限,当时有些译文在对原文的理解上,尤其是对它所携带的信息含量的理解和再现,还是有失之粗率、值得商榷的地方的。为了让译文更流畅更适应中文的需求,随意曲解增删原文内涵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桑塔格在她那篇写于一九九五年的《论被翻译》中说道:“如今,对原文忠诚的标准,肯定要比二三十年前高得多,更不用说比一个世纪前。近年来,翻译,至少就翻译成英语而言,一直是由更着重字面意义的——即更严谨的——标准衡量的,尽管大多数译本仍然未尽如人意。一部分原因是,翻译本身已经变成学术思考的对象,而译本(至少是重要著作的译本)都有可能受到学者的检视。翻译者的任务似乎已被学术标准同化。”在我看来,桑塔格的这番论断基本上也适用于我国。

再次,世界文学潮流的嬗变,本身也对我们衡量好译本的标准,提出了新的审美要求。读者对现在的译本提出批评时,往往会提到,如今译者的中文造诣远不如过去,译文读来常有生涩之感,“文采”阙如。问题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原文,和傅雷时代所面对的原文,本身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当代文学更跳跃更抽象,更重视文字所携带的意象和信息,而有意避开那些已成定式的华美程式;词语常常是符号,甚或是一种类似于网络链接似的出口,需要读者调动相应的知识储备才能领会。译者对现当代文学的这些特点需要有极强的领悟能力,

相应地,我们对译作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有适当的改变。曾有读者在微博上谴责我社福克纳的译本出现印刷事故,连着两三天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既然像福克纳这样的作品已经即将进入公版的作家,其标志性的文风特点尚且未被读者“习惯”,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至少部分对现当代译文的指责,实际上针对的是原文。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调整的并不是译文质量,而是当代文学观念的普及工作。同样地,最近在网上一几乎“全民参与”的乔布斯情书的翻译,也有耐人寻味的地方:这是一封极简单的由近乎现代口语的文字写成的信,但很多网民激赏的、认为“文采斐然”的译文都是那种合辙押韵、辞藻华丽的东西。在一个普遍认为“骈四俪六”才是文学至高境界的环境中,语言和文学实在太容易不思进取,它们的发展和活性都难免迟滞缓慢。而这种现象,归根到底,仍然需要更多、更忠实、更适应全球化语境的译作来拯救。

我再谈谈我个人的基本翻译观。完美译本的概念,是由两种长期相反的翻译标准来衡量的。一种是最低限度的改编,也就是所谓的“异化”,它意味着译本会给人一体的感觉:它保留甚至炫耀原文的节奏、句法、语调、用词癖好。这一理论的最著名的狂热倡导者是纳博科夫,他在将《叶甫盖尼·奥涅金》翻译成英语时强调直译到了非常极端的地步,我觉得这种偏执程度,以及为了实现理论而付出的努力,要远远超过同样倡导硬译的鲁迅。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纳博科夫甚至故意向流畅以及为了照顾流畅而牺牲准确性的做法宣战。他要刺激那些习惯于优雅流畅的译文的读者,他要坚持表明,他的译文并非要自成一统,作为单纯的英文与原文

无涉,而纯粹是一系列围绕普希金的信号,要我们回身努力去理解该书的每一个细微之处。他宁可用惊奇的手法耸人听闻,以破坏、去除根深蒂固的信念。他使他的译文很难阅读,理由之一就是要让那些更喜欢自身流畅轻松的译文的人不高兴。他拒绝提供流利、自足的英文,从而给读者一种忠实的提示,这样他们必须不停地回到俄文去。他有意而透明地歪曲英文,提醒我们这种作为译文的英文自身没有独立的生命,唯有跟普希金的俄文放在一起才有价值。与此相对的做法,则是完全移植,也就是“归化”。它意味着翻译者必须把原文完整地化入新语言,使得在理想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也不觉得是在读一个译本。无可避免地,这种驱散译本背后潜藏的任何原文痕迹的做法,要求自由地处理原文。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文学翻译的实践者来说,就像桑塔格的那句中肯的说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才是大多数翻译者的用功之处。”每一次翻译实践都是在理论的两极之间平衡的结果,每个人的平衡点位置都有所不同,每个时代的所有译者的平衡点的平均值也不一样。就我个人感觉而言,随着时代的演进,这个平均值是缓慢地向“异化”那一极挪移的。

## 二、来自图书市场的挑战与机遇

市场的杠杆无处不在,不是我们无视它,它就不存在的。要探讨文学翻译的现状而无视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必然会失之空泛。

这几年,业内普遍的感觉是出版这碗饭不好吃,我们这个专业翻译出版社也不例外。市场不景气,竞争压力大,甚至,由于新媒体的崛起,

产业本身也面临重大转轨的可能,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不过,凭我这十几年来对出版市场的观察,仍然能感觉到逆境中其实也蕴涵着利好因素。比方说,比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的那段时间,现在的读者直接从国外接受的信息要快捷得多,因而本地的翻译出版市场的动态变化,也与世界潮流越来越接轨。好比说,五年前我们的从业人员和读者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英国布克奖、美国普利策奖以及世界各大图书排行榜的反应,要比现在慢得多、滞后得多。而信息沟通的“提速”,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又产生了某种聚合效应,使得我们现在的翻译出版市场,与国外的“时间差”和“地域鸿沟”,在逐渐缩小。不言而喻,这一点对翻译出版市场的良性发展,比较有利。发达国家的图书市场机制更成熟健全,他们针对各个门类、各种读者的细分市场条分缕析、秩序井然。我们这些搞翻译文学的,前几年碰到的一个困境就是,外国的现当代严肃文学和类型小说的现成格局,被系统地介绍过来,似乎总有水土不服的感觉。国人对于“世界名著”的概念,似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停留在几十年前苏俄制定的标准。但这种情形,在近几年有并不迅速但确实存在的改观。也就是说,在外国文学市场上,专业化的运作渐渐地有了优势,专业人士对于价值的判定与读者口味的吻合度也渐渐地有了一定提高,各种外国文学分支类型的读者,无论是严肃文学的还是通俗文学的,在总体数量上略有提升,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口味,比以前更理性,也更容易把握规律。说得简单点,当我们推出一位作家、一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比以前更清楚地知道,读者在哪里,他们需要的是怎样的

包装和内容,我们的底气更足了。这种底气与我们自身的成熟有关,也与读者的接受度的成长有关。作为一个天天身在第一线的编辑,我越来越感觉到,一旦偏离这条专业化的道路,我们的选题结构就会紊乱,我们的传统优势也就无法发挥。

### 三、时代变化需要对文学翻译观念作出调整

走专业化道路,当然要力求出精品。然而,现在的外国文学领域,竞争空前激烈,而竞争对于时效的要求难免与精品战略产生矛盾,从而给编辑带来困扰。最直接的例子是,我们的传统操作模式能打磨精品,但翻译和校稿周期长,无法满足读者尽快甚至同步阅读国外优秀作品的要求。社会上许多有识之士都对翻译质量下降深感忧虑,大声疾呼,即便是我们这样在同类出版社里以质量见长、口碑较好的出版社,稍一松劲,也很容易出现纰漏。这个问题要分两方面看。一方面,我们确实要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精品战略,继承传统优势,尤其是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尽可能避免类似于“常凯申”那样荒谬的错误。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外语普及程度的提高,文学翻译的观念,无论是其操作方式,还是评判标准,都需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虽然我不主张任何激进的革新,但对这些现象及时做出思考和判断,还是十分必要的。

比如说,“信达雅”的标准,尤其是这个“雅”字,如今应该怎么理解;在读者对欧式词汇和语法的宽容度越来越大的今天,“信”和

“达”又该制定怎样的新标准；对书名的翻译究竟是应该一板一眼，还是要考虑到两种语言读者的审美差异；每天都在诞生的新词应该以怎样的标准和速度引入翻译，使之固定化；以前译文中是绝对不可以保留原文的，现在这个标准是否有必要打破；在互联网轻易就能提供简单检索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必要削减原先简单的说明性注解，而扩大阐释性注解的比例……诸如此类的问题看上去是细节，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每天都会碰到，而现成的翻译理论和行业标准，仍滞后于实践操作。作为在这个行业的各个环节都摸爬滚打过的实践者，我深感，我们不仅有义务被动地去面对问题、处理问题，而且有责任思考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总结有关规律，成为领行业风气之先的从业者。我可以再举一个例子，以前说到双语读物，我们总是直接联想到那种形式死板、逐页对照、满足学生要求的语言类教辅读物。但事实上，现在的外语普及程度高，很多原先只读译文的文学爱好者也希望通过参考原文，在“对照”中得到在两种文字间穿梭的文学化而非教育化的乐趣。我预测，针对他们的特点，会有越来越多面目一新的双语文学书或者注释本应运而生。由此还可引发一些前瞻性的思索：今后的文学翻译，在归化和异化的天平上，往异化的倾斜度会不会更大一点；我们在翻译、阐释译文的时候，需不需要更多地借助于全面或局部展示原文的方式。这种做法在很多学术书上已经开始采用，那么文学书有没有必要借鉴呢？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

#### 四、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人才缺口

出版是智力密集型产业，得人才者得天下。文学翻译出版所需要的人才，无论是译者还是编者，都需要有扎实的双语功底、高深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而同时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才有相当大的缺口，因为有很大部分都分流到待遇更为优厚的行业中。能坚守并且有所建树的中青年人才，数量确实远远小于这项事业目前的需求。我想，解决这个问题，首要的当然是改革体制机制，增强行业活力，提高行业待遇，让这份职业更吸引人。除此之外，另外有两点值得说一说：

其一，加强这个行业的自我宣传。其实投身于文学翻译出版事业的年轻人，有相当部分是凭着对翻译和文学的兴趣和热爱。我曾经在华东师大、复旦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硕士班里，开过几次小型讲座，给正在读研究生的同学介绍我们从事的这项事业，结果发现：第一，学生们其实对这一行相当陌生，对出版社的性质和构成、文学翻译的运作方式和特点，几乎一无所知，远远不像他们提到会计师事务所时那般如数家珍。第二，其实任何一代人，不管表面上有多么物质，文学梦都不会泯灭。那几次讲座结束以后，有不少学生给我写信，抒发他们从小对文字的爱，对翻译的憧憬，希望能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甚至加入这项事业。所以说，为了这项事业的长久发展，我们很有必要向社会上做更多的自我介绍和自我宣传，吸引那些有志于投身其中的年轻人。高等院校始终是我们译者队伍最重要也最稳定的来源地，为了这个行业的持



久繁荣,也为了真正的学术价值能得到凸显,我愿意借所有机会大声疾呼:以符合学术标准的方式翻译一部有分量的文学作品或文学研究作品,其难度和意义绝对不逊于撰写一部有创见的学术专著——这一点,尤其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是一件不言而喻的事情。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如果能给业余担任翻译的高校教师以更多的学术肯定,甚至他们的译作也能合理计入学术成果,则非但能有效弥补文学翻译事业的人才缺口,也有利于树立公正合理的学术机制,不夸张地说,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其二,以灵活多样的方式吸纳人才。国外的出版业的操作模式已经越来越趋向于灵活多样,出版社内人员精简,大量工作外包给自由职业者,尤其是案头编辑、美术编辑等工种。通过多种形式的合作,能有效补充人才缺口,同时也为出版社节省成本。至于我们的译者队伍,由于翻译稿酬偏低,傅雷那样的专职文学翻译,基本上可以说是“前有古人,后无来者”。而目前翻译出版界真正的主力军是兼职翻译,其实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中国,我接触到的一些国外文学翻译也断言,如果纯粹从事文学翻译,是不可能养活自己的,这一点与科技、经济甚至同传翻译等所谓的实用类翻译,完全不同。所以,国外的文学翻译也很少有专职的。目前,国内的兼职文学翻译最多地集中在以下几种职业:(1) 高校

外语专业师生。(2) 本身从事外国文学编辑工作的,比如我本人。(3) 主业是从事实用类翻译(科技、经济、法律、同声等)的双语人才。而还有一类人是以前完全没有进入我们视野的,他们往往与出版方毫无联系,做文学翻译纯粹是为了兴趣,自己物色作品翻译后发表在网络上,有点像网络上自发翻译电影的那些轰轰烈烈的字幕组。像《夏洛的网》、雷蒙德·卡弗的作品,网上都有几种版本的译文。《哈利·波特》系列每次发布新作品,网络翻译爱好者都会第一时间分工合作,拿出他们的版本给网民共享。翻译正规军的质量,也常被他们拿来批评。这个现象被许多媒体拿来讨论,大家往往关注的是知识产权问题,这个我们今天且不谈,我觉得从翻译的角度来看,他们倒可能是对今后文学翻译队伍格局产生微妙影响的一群人。事实上,目前有些出版社已经与这些自发翻译的组织和个人有一定接触,也有不少被“招安”的译者与译文。

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总的意思就是一句话:文学翻译出版事业方兴未艾,这个有着不短历史的领域里有许多新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研究。我相信,实践是通过理论的引导渐趋完善的,同样,理论也会通过实践的反馈更具有现实针对性。套一句时髦话,让梦想照进现实,让理论照进实践。